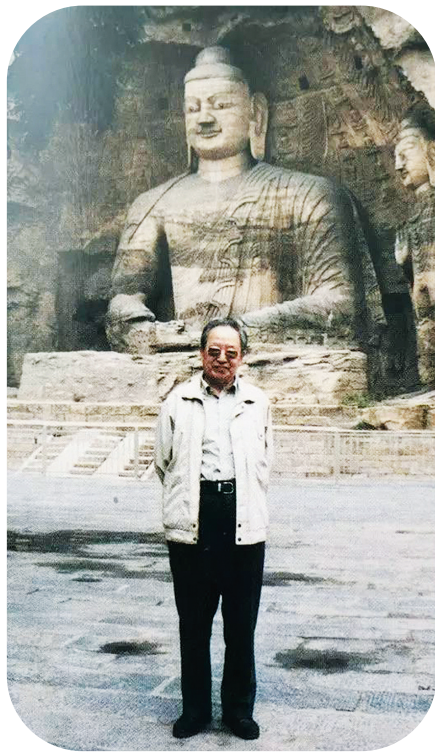


# 一代学人宿白魂归云冈

本报记者 梁有福



3月15日,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原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骨灰安葬仪式在云冈石窟景区举行。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参加仪式。

宿白先生的亲属及学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崇峰,浙江大学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捷参加仪式。

宿白先生(1922—2018)字季庚,辽宁沈阳人。1948年北京大學文科



研究所研究生肄业,1951年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的发掘,1952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學历史系和考古系任教。曾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2016年,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被授予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张焯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说:“宿白先生一生关心云冈石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事业,多次带学生考察云冈石窟,直到晚年依然牵念云冈的学术事业,是云冈学的实际奠基人,为云冈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确定了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缅怀宿白先生,学习他严谨的学风和研究态度,更敬佩他为民族争光的气节。”

杭侃在讲话中说:“宿白先生魂归云冈,既是因缘所致,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我们要继承先生严谨的学风,牢记先生谆谆教诲,沿着先生坚定的足迹,持续推进云冈学的发展,让云冈学走出国门。”

作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宿白先生拓展了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举凡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录等,均有开创拓展之功,后学得以循径拾阶而入。宿白先生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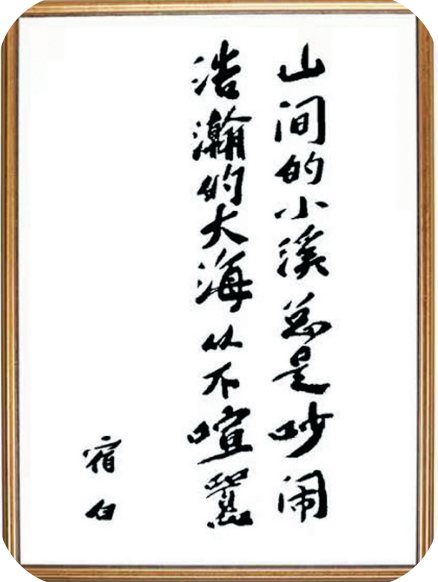
1938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京

都大学的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调查,其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最高研究水平。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籍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原文,其所述内容涉及了北魏历代开窟建寺的问题,更可贵的是弥补了唐代贞观至金代皇统约五百年间云冈石窟修建的历史空白,这是云冈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随后,宿白先生在《考古学报》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结合文献和考古实际,对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论提出质疑,并系统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云冈分期



新论。最终,日本学者承认了宿先生的云冈分期。这场宿白先生与日本学者的论争,确立了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学术地位,宿白先生被举世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目前,宿白纪念馆已装修完成,



位于云冈石窟景区一窟东侧。云冈研究院希望宿白先生生前友好积极捐赠有关纪念物品,以充实馆藏,激励后学。捐赠联系人:王嘉琦,联系电话:0352—7992626、18835447279,邮寄地址: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云冈研究院。

## 滴血的莲花

——云冈石窟第11窟停工之谜(一)

赵昆雨 员小中



应该说,第11~13-4窟是由同一造像集团势力发愿营造的一个区域,若非背后有一种神秘力量掌握着生死牌,它的结局何以如此惨淡。这一摧枯拉朽的神秘力量就是——宫闱之变。

第11窟留下的不解问题太多太多,若不是因了高悬在东壁上端的太和七年(483)造像题记,关于这个洞窟的身世,恐怕连谜这样的话题也无从谈起。

这是云冈石窟现存时间最早、文字最多的一方题记,全文共337字,也是平城魏碑中的精品。

造像题记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出资造像的人也叫功德主或发愿人,他们通常会嘱托工匠在雕像即将完成时,另外刻上一段发愿文,说明发愿的时间、发愿人的由来、发愿的原委和希望实现的愿求。

石窟中,有纪年的造像龕就是一把等量时光的标尺,让行进在岁月长廊里的后人摸索着这些标记,去拼合、还原洞窟开凿历史中那些生锈的碎片。

幸好有它们,有它们,便有故事。

最初的皇家工程

第11窟旧称“四面佛洞”、“接引佛洞”,为“五华洞”(第9~13窟)之一,开凿在云冈北魏皇家工程的核心地带。从外崖壁可以明显看出,连同右侧毗邻的第12、13窟以及13-4窟,这片外

崖立壁高近20米的区域是按统一计划斩山辟出的,如此浩大的工程定然是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所以,这个区域的洞窟属皇家性质。

第11窟是一个方塔居中的塔庙窟,中心塔柱是对现实中塔的模仿与象征,当时平城之境,佛塔高凌,列刹相望,壮观巧妙。云冈中心柱式洞窟的设计方案首先用于第11窟,表明第11窟功德主的身

身份与地位极不寻常。

大约,第11窟最初的工程仅仅凿出窟形并完成了中心柱的基本样貌就戛然而止了,即使今天,那朴素简约的中心柱,依然散发着停工前的气息。这种样式的中心柱,既不见于凉州,在云冈也是浅尝辄止。塔柱以北地面基岩高出窟门处地面近一米,表明第11窟故然经历了两次工程,最终地面降层工序都没有正常完工。至于窟内四壁的状况,从目前壁面的突凹起伏及现有龕像的分层布局结构来看,在第一次工程中,既未平整,也无造像。

那么,第11窟最初的工程究竟起于何时呢?我们只能依据现存的太和七年造像龕题铭用倒推的方法去估算。太和七年,是该窟二次复工的一个时间坐标,其距最初的建窟时间应有若干年差。像第11窟这等规模的大窟初步建成该需要多少年呢?从掘出窟形、初步凿出四壁壁面、镂出中心塔柱雏形,停工前要达到这种程度,保守地说得需要二、三年时间吧。再考虑到该窟是在搁置了数年后继而复工的,则需再上推若干年,也就是太和初年。

二次补凿工程与民间力量的介入

太和七年晚春的一个午后。枯败了多年,第11窟窟前的废石堆被清理出一条便道,封闭已久的石

砌窟门被拆开,窟内,一束光正由明窗投射在未成形的壁面上,弹飞的浮尘在光影中从容地飞,飘飘渺渺,像遥远的梦正在醒来……

打开窟门是为了从平城专程而来的道育、昙秀、法宗等几位邑社邑师,他们得到了官方的许可,被允许进入窟内考察,也是多年来走进这座洞窟的第一批人。

道育、昙秀、法宗几人共同领导的邑社在平城很有影响力,五十四位邑义信士女既有财力又有社会地位,很幸运,他们首先获准在这座废弃的洞窟内雕刻造像。

道育环视全窟,看上去当初这里只完成了洞窟的大概,东壁上端的一块壁面空间算得上最为平整,采光也好,包括随行的匠师也认为那是一个较理想的位置。

太和七年八月三十日,由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共同出资发愿雕刻的龕像竣工了,他们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进入石窟寺造像的邑社组织。此后一发不可收,另一些邑社以及大批僧俗信众蜂拥而至,贺若步落敦、常山太守田文彪妻以及一些清信女和佛弟子都在此窟内开窟造像。

二次补凿工程完全颠覆了第11窟最初的设计思想,为了省工省时,许多龕像因壁面走势,见缝插针,既无计划、无秩序,又浪费壁面空间。

从太和七年开始至太和十三年,第11窟二次续凿工程大致完成,仅西壁个别龕像、窟门及明窗两侧壁的施工一直延续到太和十九年。不过,最终也没有人愿意出资将窟内地面降层工序遗留的多余岩石取平,行在上面,闪深踏浅,犹如醉翁。

《云中图》中露天机

隋唐时,有人依据北魏时的记录整理出一本专讲平城地理史事的著作——《云中图》,可惜,此书今已佚亡,作者是谁,书中的详细内容是什么等等均一无所知。曹衍《金碑》中多处转引此书,说明该书在辽金时仍存世。其中一条信息量很大:

文成和平八年、献文天安元年革兴造石窟寺。然未知有何所据。此处,“和平八年”应为“和平六年”之误。

过去,每论及献文时代,人们总认为他任期内,重点是在平城的建置与鹿苑的开创上,而疏于经营云冈。献文好释老,经常与沙门及谈玄雅士论道。从公元465年嗣位到471年逊位,他当政六年,后四年做太上皇,总共十年的时间里,虽然受到冯太后的掣肘未能独揽朝纲,但施政的权力毫不削弱。“献文革兴造石窟寺”一语,说明献文时期云冈佛教造像活动仍在进行。皇兴元年秋



八月,初为人父的献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这个时节来云冈当然不是祈雨,而是为某一洞窟的完成或开工典礼。

曹衍不甚解“献文革兴造石窟寺”一语,故云“未知有何所据”。其实,此“革新”所涉范围较宽泛,洞窟的形制、粉本的取舍、造像的风格等都在革新之列,工匠体系、设计团队甚至主持工程的高僧也可以革新。《云中图》中的这句话是就文成时期昙曜五窟的风格与样法,在献文时期作出一定的调整与变化而言。如何变化?最明显的就是第11~13-4窟四个洞窟分别设计为四种不同形制的窟式:

第11窟,塔庙窟,中途辍工;  
第12窟,具前后进室的佛殿窟,基本按计划完工;

第13窟,大像窟,无论窟形还是造像风格均与昙曜五窟接近,属第17窟亚式,开工时间稍早,但最终未完工;

第13-4窟,洞窟的高度与进深都很特别,曾被怀疑为涅槃窟,中途辍工。

四个洞窟有继承,有创新,也符合《魏书》有关献文时代平城营建工程偏重雕饰的风格特点。这组统一设计、完整规划的大型洞窟,除了第12窟勉强完工外,其余洞窟不是中途停工就是最终未完工,为什么呢?北魏太和初期,社会繁荣稳定,佛教弘昌炽盛,既无石质问题,又与迁都无关,如何解释这组洞窟的停工问题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资金问题,开凿如此规模之大的洞窟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和物资保障。但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一区域洞窟的停工与资金链断开有关。另一就是政治原因,——这一时期的北魏政权之争,可说是惊心动魄。

第11窟为什么停工?功德主是谁?也有日本学者认为,第11窟的停工归咎于曜曜丧失沙门统地位。

无论如何,昙曜充其量也只能代表一个个体,而云冈代表的是国家的意志和力量。昙曜本人政治地位的升降乃至死亡,都不足以撼动一座大型皇家洞窟的开凿进程,更不会导致其停工或废止。这个原因应该排除。

云冈从献文帝时期开始,以皇室显贵为主体的造像集团迅速崛起,为国祈福铸窟,渐成风气,第11~13-4窟就是由同一造像集团势力发愿营造的一个区域。如果不是因为背后有一种神秘力量掌握着生死牌,这组洞窟的结局何以如此惨淡。

这一摧枯拉朽的神秘力量就是——宫闱之变。

##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一)

李裕群

大同云冈石窟是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由皇室、臣僚和高僧经营开凿的石窟大寺,开创了中原地区开凿石窟寺的先河,在中国石窟寺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漯水》条中曾描述,北魏皇室在云冈“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唐道宣《续高僧传·昙曜传》则记载:“龕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佛像,穷诸巧丽,龕别异状,骇动人神,栴比相连三十余里。”展现了云冈石窟壮丽奇伟、冠于一世的风貌。

作为中原北方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宏伟的云冈石窟,早已为学术界所瞩目。从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者纷纷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学术考察。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考察与研究,如20世纪前期就有伊东忠太、大村西崖、关野贞、常盘大定和小野玄妙等著名学者发表了有关云冈石窟的研究文章和专著。1938—1945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记录和实测工作,同时对部分窟前遗址作了小规模发掘。1951—1956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的形式陆续出版了16卷32本大型考古学报告:《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由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出版),全面总结了过去的研究成果,是当时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集大成代表作。

但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云冈所在属于砂砾岩体,石窟中原有的许多重要碑刻、题记历经千年沧桑,大

都已风化磨灭,这为深入研究云冈石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20世纪前期的研究,对云冈石窟大型洞窟开凿年代次序的排列以及石窟开凿终止年代等重大问题的探讨仍嫌不足。

这一方面的突破性研究缘于碑刻资料的新发现。1947年,宿白先生在参加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偶然在缪荃孙传抄的《永乐大典》卷4650天字韵《顺天府志》所引元末熊自得编撰的《析津志》文内,发现了长达二千一百余言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该碑文为金皇统七年(1147年)夷门(今河南开封)曹衍应大传菩萨戒提点西京大石窟寺沙门禀慧之邀请而撰写的。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熊自得亲访云冈,抄录《金碑》全文,后补入《析津志》一书内。由于《金碑》铭刻未见有拓片流传,因而所录碑文成为孤本,弥足珍贵。宿白先生对碑文所涉及的所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考证。1951年整理完成了初稿。1956年,经改订后,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资料的初步整理》一文。文章序文中指出,《金碑》“记述详细,征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而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也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的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材料。”充分肯定了《金碑》对于研究云冈石窟的重要史料价值。

## 云冈石窟景区季节性讲解员招聘公告

云冈石窟景区因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及大专院校公开招聘季节性兼职讲解员若干名,招聘条件如下:

- 1.身体健康,口齿清楚,普通话标准;
- 2.要求大专以上学历;
- 3.年龄限25岁以下,男女不限,女性身高1.65米以上,男性身高1.75米以上;
- 4.形象好、气质佳,吃苦耐劳、无劣迹和不良嗜好;
- 5.热情大方、思维敏捷、善于沟通、协调应变能力;
- 6.有相关讲解工作经验,或精通英语口语及其他语种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 7.季节性讲解员要求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暑假及旺季上岗;
- 8.经初选、复试及专业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录用。

符合条件并有意愿者,请填写右图附件中的个人简历电子表格,并

发送至邮箱 ygjiedaiban@163.com,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报名截止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3月20日。  
联系电话:0352-7992655。

1\_附件个人简历.docx



13.31KB



微信长按识别二维码获取文件

有效期至 2021-04-05 12:30:58